

钱穆及其文化学研究

钱 婉 约

钱穆,字宾四,1895年7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南延祥乡。钱家素重读书,祖父钱翰如,是清季秀才,早逝,给后辈留下一函手抄五经和五色圈点的史记一部。父亲钱承沛,16岁参加县试得案首秀才,此后却屡试不中,遂绝意科场,在钱穆12岁时就过早去世了。钱家因此贫困,但钱母还是想办法供儿女们继续读书求学。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起进新式学堂读书,先后在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读小学,常州府中学堂、南京钟英中学读中学,其间因成绩出色,获多次跳级,17岁就读完高中。由于生活所迫,未能升入大学继续学习,于第二年即1912年返回家乡,任小学教师。1923年到1930年在中学教书,先后执教于厦门集美学校、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在这18年中小学教学生涯中,钱穆笃志自学,毫不懈怠,他自述这段时间的学习时说:“余之读书,最先从韩柳古文、唐宋八家入门,随即有意于孔、孟儒学,又涉及古今史籍。”^①可见,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已都有涉猎。他把自学、教书与著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墨子》、《国学概论》、《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著作,奠定了他国学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后两部书,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关注。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作的。康有为在他这部名著中指出:所谓西汉末孔壁发现或献自民间的古文经书,其实都是刘歆为了助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们湮灭了孔子的真意,欺骗了近两千年来的中国读书人。此书在戊戌维新期间,对于打破学术界的泥古守旧,打击政治上的恪守祖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直接启发了近代疑古派的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但是,如果把《新学伪经考》作为一部讨论今古文经学的学术著作,它的结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并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证上都很片面、武断。这一点,即使是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也有所批评^②,但他未能作全面而确凿的论证。钱穆此书就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辨驳康氏的谬误的。他用年谱的著作形式,排比出刘向、刘歆、王莽的生平活动,并从汉元、成、哀、平帝、新莽之际学术风尚的趋势和政治法度的因革,证明刘歆造伪助莽在时间上的不可能、在情理上的说不通。此书并没有抱着经学家的门户之见来申古抑今,而是以史学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为经学破门户显真是,倡导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值得称道的是,顾颉刚先生曾崇信康有为今文说,但见钱穆此文手稿后,叹其精审确凿,不嫌异己,慨然在其主持的《燕京学报》民国19年第7期上公开刊出,随即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北平各大学经学史课程宣讲康有为今文学说的,遂在秋后停开或更改旧说。

《先秦诸子系年》是作者积四、五年来考辨先秦诸子生平、著述的文章而成的考证巨著,共160篇,30多万字。古代中国学说,经学占统治地位,诸子学只是其附庸,研究得很少,只是在清末,才出现了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樾的《诸子平议》等书,对于诸子全面、系统、

详实的研究著作还没有。钱穆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昔人考证诸子有三个缺点：一、“各治一家，未能贯通”；二、“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三、“依据史籍，不加细勘”。本书力图克服这些缺点，对上起孔子、下迄李斯上下二百年的历史，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凡属这期间的学者，一一详考，对所引用的材料，也尽量辨其真伪，纠其谬误。这部书第一次系统详细地考证了先秦诸子的生平著述、学术师承，使二百年纷繁、庞杂而又十分重要的先秦学术史有了初步的、清晰的面貌。蒙文通读此书稿后赞曰：“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③

钱穆以一个未进过大学的中学教员，而写出了这两部力作，引起了当时一些大学教授的瞩目。经顾颉刚先生推荐，他来到北平，开始了学术生涯的新阶段——大学教学阶段。

钱穆于1930年秋到北平，先在燕京大学任教一年，后转入北京大学，在历史系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又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选修课，这门课与几年前梁启超在清华所开的课同名，而所讲内容、观点常有不一致之处，因此引起同事、学生的普遍关注，一年后他又改开《中国政治制度史》选修课。钱穆主张中国四千年古代史，应该是一门通史，而不应象现在这样由几个教员分任各段，使学生对中国历史难以有一个系统一致的认识，所以从1933年起，学校决定由钱穆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他是北大历史系独立担任通史课的第一人。任教北大期间，钱穆还同时在北师大、清华大学两校兼课。

在北平期间，与钱穆经常往来、切磋学问的同事有：顾颉刚、陈寅恪、胡适、冯友兰、贺麟、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闻一多等。钱先生专诚于学问，对于学术上的问题执着而耿介，这里仅举他与胡适讨论老子年代问题为例。胡适是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大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他用近代史学方法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部书中，他延用传统的观点，认为老子是孔子同时代而稍长于孔子的人。钱穆基于自己对先秦诸子已有的考辨，提出异议，并从先秦儒道思想发展的系统性角度，论证老子必当生于孔子后，而且《老子》的成书当在《庄子》内篇之后。当时，老子年代是一个争论得很热烈的问题，梁启超、冯友兰、顾颉刚等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讨论所及关系到儒道思想的起源问题。为此，胡适又作《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和《说儒》两文，钱穆又作《再论〈老子〉成书年代》，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观点，认为《老子》书出于宋钘、公孙龙同时或稍后。后来钱穆将有关讨论老子的论文编成一集，成《老子辨》一书。“知出于争”，愈辩论愈有利于问题接近于真相。从以上争论中，可见当时学术界精英们砥砺学问之一斑，尤其可以看到钱穆不盲从权威，不迷信成说，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对问题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

1937年抗战爆发，钱穆随北大南迁至昆明西南联大，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国土沦丧，政权偏隅，抚今追昔，钱先生的心情十分悲愤。他凭着历史学家的爱国良心和责任感，认为要发动人民起来拯救民族危亡，就要使人民对国家民族有深厚的爱，而使人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切的认识，是产生爱的基础。所以，他决心在国难之日作国史，以昭示天下。同时，因为当时联大在流亡中，图书资料缺乏，历史系的学生急需一本通史参考书。于是，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情况下，钱先生克服困难，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中，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写成了一部50多万字的《国史大纲》，这里包含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说明，也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

钱先生是一个挚诚的爱国史家。1935年10月，他曾与姚从吾、徐炳昶、孟森、顾颉刚、钱玄同等教授条陈抗日，促请南京政府速定抗日大计。他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申述自

己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看法，后编辑成书的有：《文化与教育》、《政学私言》、《湖上闲思录》，后又完成专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这些著作（包括《国史大纲》）从不同角度反复说明了作者这样的思想：中国历史文化内部，蕴育着使民族国家发展前进的“生力”，我们应怀着“温情与敬意”去了解中国历史，缅怀先民业绩，从中寻求拯救现实，通向未来的途径，而国人不明国情，蔑视历史、盲目崇外，动辄以西方学说和制度来否定、反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正是造成中国目前病态的原因。它体现了在动荡忧患的年代里，一个历史学家的沉思和探索。

1939年暑假，钱穆回苏州省亲，居苏一年，撰写了《史记地名考》一书，同时，遵顾颉刚先生嘱，主编《齐鲁学报》。一年后，钱先生离苏入蓉，任职流亡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不久接任该所主任，并同时在齐鲁大学兼课，直至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此后，钱穆又先后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和无锡江南大学等处任教。

1949年春，钱穆离开大陆，到香港办学。在此后的18年中，他以一介书生，联合在港其他几位赤贫的教授，在艰苦的环境中，从无到有，不断建设，创办起一所文、理、艺术各科兼备的新亚书院，并亲任院长。新亚书院以传播中国文化、恢宏民族精神、培养有人格的学术人才为宗旨，其办学方针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钱先生为新亚、为在香港培养民族文化人才倾注了心血，新亚的教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新亚作为基本书院之一而加入，它反映了中国民族文化在香港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这不能说没有钱先生的贡献。

在港期间，钱先生不仅为新亚的成长辛勤操劳，始终与师生们同甘共苦，并且著述不断，学术思想达到渐臻圆熟之境。主要著作有《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和《宋明理学概述》。这些著作在台港和海外流播甚广，影响颇大，其中有些著作还被定为投考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必读书。

这期间，钱穆还多次应邀去台湾各地和美国耶鲁大学、马来亚大学讲学。并先后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和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

1967年10月，钱穆离港定居台北，担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班主任，先后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言”等课，课余便一意著述。1969年10月，钱先生以76岁高龄，完成了又一鸿篇巨著《朱子新学案》，全书共5册，百余万字。此书从朱熹文集、语类中采集材料，是一部周详的朱熹思想资料的汇编。作者把这些思想资料，按自己对朱学的理解、研究分门别类，构成体系，又于每一条目中结合整个体系加以评述、考证，阐发朱熹学术思想的真谛，考辨朱熹著作、书信、语录的写作年代。卷首冠有《朱子学提纲》近20万字，概述作者对朱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因此，此书又是作者多年来对朱熹研究的专著。

此后，钱穆的著作主要是对自己以往学术成果的编辑整理，计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8册，分上古、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六编，收集作者自1924年以来所有学术思想的散篇论文。《古史地理论丛》收集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此书是根据1978年钱先生赴新亚书院，作“钱宾四学术讲座”首讲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历史、民族文化的一个总结。《师友杂忆》，记录作者一生的教学、著述、交友、游历等活动，叙述自己学术思想的发展演进，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

现在，钱先生已有95岁高龄了，在台北士林路外双溪草木葱郁、僻静幽美的“素书楼”里，过着他以诗书为伴、淡泊清心的晚年生活。

钱穆一生虽学贯经、史、子、集，著述数百万言，然而其学术的最后归旨，则在研究文化问题上。早年，他曾潜心于诸子学、经学、中国通史的研究，从30年代后期起，他的学问有一转向，他自述到：“及抗日军兴，避至昆明，时欧洲第二次大战继起，……国内纷呶，已有与国外混一难辨之势。而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握，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④国家乃至世界的动乱，民族文化的衰颓，使钱穆决意转向文化研究。从1947年《中国文化史导论》首次系统阐述中国文化，到1979年讲演录《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出版，前后30多年，时代既变，社会政治、学术思想、人物风情也都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而钱穆则不忘初衷，始终关注着文化问题，坚持学术上的独立精神，锲而不舍地进行中国文化研究。30多年来，他一共出版了10多部有关文化方面的专著和演讲录，其它“有关历史方面之文字，则一皆以文化为中心。”^⑤这些著作，坚定不移地立足于本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冲击，面对崇洋蔑己者“全盘西化”的论调，向迷茫自卑的中国人，阐发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生命力，以唤起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

钱穆是从对历史的研究而转向文化研究的。因此，他的文化研究，体现了一个历史家的眼光和思维。所谓历史家的眼光和思维，是与哲学家相对而言的。近代以来的文化讨论往往是以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作思维方式的，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早的著作就是梁漱溟先生撰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先生在这本书里，把人类文化分成中国、印度、西方三种类型，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意欲自为调和”，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西方文化则是“意欲向前要求”，这是梁先生对人类文化经过深思熟虑、反复研究后告诉给读者的简捷结论。在此之前，《新青年》与《东方杂志》进行文化争论，也曾概括中西文化的差别，如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智性文化与德性文化等等。这些概括与总结，便于人们从哲学的高度来理性地把握不同文化的特质。然而哲学观点的弊病也正于此显示出来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以往全部生活的总和，它是复杂多样的，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同一时期也还有地域文化的差异，有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差异。用一个哲学概念来概括这样丰富复杂、不断变化的文化实体，往往使人们忽视了文化的复杂性和具体性，而执着于哲理的辩论，容易导致各执一端、偏狭静止的状况。钱穆文化研究的不同，即在于用历史的眼光、具体的阐述。用历史的眼光看文化，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有其萌发、生成、发展、演变的生命史；有生命的东西就有个性、有精神，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钱穆的文化学研究，就是要体现中国文化这部活的生命史。

钱穆的文化定义是宽泛而具体的。他说，文化即人生，即“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整一全体。”^⑥包括民族国家的形成、社会理想和伦理观念的确定、各项制度的健全以及思想学术的演变等等，几乎是民族、国家以往全部生活的总和。从这样的文化概念出发，钱先生把中国文化史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古到秦统一，此时期是国家凝成、民族融和的阶段，它经过了唐尧虞舜的禅让制度，夏商的王朝传统制度，西周的封建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制度逐步完成，民族界线逐步消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中国人对人生的理想和信念也至此确定下来，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演进的基

本方针。第二阶段是汉唐时期,经过两汉的统一、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再融和、隋唐的统一,中国人把社会的一切规模与制度规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考试制度、军事制度等等都健全和稳定了下来。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唯此共通境界安顿妥贴了,才能说得上人的个别发展。第三阶段是宋明清时期,此阶段的显著发展是文学与艺术方面,是中国文化的个性发展时期。第四阶段是清末以来到最近以及将来的时期,人事上的共通方面与个别方面都已按排照顾到了,下面应该注意到四周的物质环境上,来尽量地改善与利用它,并且谐调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等^⑦。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对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演进步骤,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了清晰的论述,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史著作,或延袭历史朝代的分期法,或按照社会形态的分期法,或把文化史与学术思想史的分期混同,而是体现了鲜明的文化学观点,从这里可以领会到钱穆对中国文化这部活的生命史的独理解释。

钱穆研究中国文化的宗旨在于揭示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质、基本精神。他认为,人类文化就其不同地域而言,可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三种。农耕文化多在温带有河流灌溉的平原上,游牧文化发展于草原高寒带,商业文化则繁盛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自然条件影响其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影响其文化精神^⑧。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类型。其生活方式是安守田地,尽人力,赖天数,以期保收保种,自给自足。这种生活方式世代相传,使得中国文化固守本土、安定守成、沉着稳健,但缺乏奋发进取精神。它与游牧文化、商业文化相比,是一种“内倾性”的文化,具有“天人合一”、“内外合一”的民族性格。所谓“天”是指天然,“人”是指人文,人类是自然界中一类,脱离了自然也就没有人生。因此,中国人的人生要求是尽量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故称“天人合一”;所谓“内”,是指内心世界、精神境界,“外”是指人生赖以展开的外部物质条件,中国人向来身心并重,内外谐调,而不偏重哪一方,顾此失彼。所以说是“内外合一”。

钱穆在其洋洋百万言以上的各种文化学著作中,周详地论述了这种农耕型文化,从人生理想、思想学术、生活习俗等多方面,全面揭示出这种“内倾性”文化、“天人合一”、“内外合一”性格在中国历史中的反映。

首先,道德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亘古不废的支柱。道统与法统,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因素,道统的承传者是“士人”、“儒师”,法统的承传者是皇帝、国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向来是道统居上而法统居下,“师”更崇于“君”,因此“尊师重道”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皇帝、国君的地位至尊,但相对于“道”,也只是“替天行道”的天子。可见“道”在中国人心中的至高无上地位。而这种至高无上的“道”所反映的道德精神,又是平易而切近人生的,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感染和教育作用。它强调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责任与义务,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这种责任的最高境界;它强调一个具有道德精神的人具有无限的力量和作用,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对这种力量 and 作用的最高估计;它更强调人人都能成为具有道德精神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自己的理想人格,所谓“人性善”理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对人们修身行道的最好鼓励;而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实现人生不朽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是中国人最高的人格理想和人生追求,也就是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中国人评人论事,不以成败论,而是以是否体现了道德精神为最后标准;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伟人伟业,都是因其体现了道德精神,而成为万世中国人的人格楷模。道统与法统的相提并论,反映了中国人将内在德性与外在权势相合一的思想,体现了农耕型文化“内外合一”的特性;而视道统于法统之上,推崇道德精神,则正是中国人“反

求诸己”的内倾性性格的体现。

如果我们把推崇道德精神理解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的话,那么,主静重化求同就可以说是钱穆对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总结。静与动相对,化与变相对,同与异相对,中国人“静”、“化”、“同”的思维、行为特色,是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的。

中国人的历史观中有“因”、“革”两个概念。“因”者因于前时之旧,侧重继承沿袭;“革”者革成后代之新,侧重变化改造。中国历史的进展说明,因革两因素中因占了主导作用。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⑨孔子从夏商周的因袭损益上看到了历史发展中的继承关系,并且从他的思想中模拟出百世以后的情形。这是儒家因袭历史观的典型理论。萧规曹随的历史故事为后代广为传诵,反映了人们对这种重因袭、少独创行为的赞许和默认。从历史演进看,西方历史每于斗争中见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线的时期,常常在惊心动魄的社会震荡中产生;而中国历史则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缓步骤得进展。钱穆曾打比喻说,中国史如一首诗,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西方史如一台剧,剧情冲突,各幕有截然不同的变换。

与这种历史观相关的是重化不重变的发展观。化是一种自然的、内在的、不显著的变化,变是一种积化而成的、较显著的、表现为外在冲突的变化。《易·系辞》曰:“化而裁之之谓变。”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变是以化为基础的,而且本质上就是化的某一阶段,是截取化的某一特殊阶段而显现出的变化情形。中国的农耕文化,必须依赖时间、天候的推移而进行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等一系列农事,绝不能拔苗助长。这种依时而行的生活方式,也促使中国人注重自然的渐变,人文的自化,而不习惯于人为的求变。诸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只能产生在工商业发达的西方国家。

中国人的人伦观念提倡求同存异,将心比心。求同是为善之本,是谦虚恭敬之本。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皆可以为尧舜”,反对出人头地,反对好为人师,这都是劝人求同为善。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⑩这是孔子的求同谦恭之心。从中国学术史来看,中国学者讲究“述而不作”,“我注六经”,注重学派、流派的传统,而不推崇专家独创,这也是趋同、守成的表现。

总之,讲因袭,重自化,求同存异是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特征,它们互相联系,互为制约,贯穿、体现在传统中国人人生的各个方面,构成中国文化内倾的、主静的性格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钱穆对中国文化提纲挈领而又细致入微的论述,这里没有武断的结论,没有空泛的褒贬,也不采取繁琐的论证。他是要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客观的介绍评说,来向中国人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和精髓,缺憾和不足,从而在“落后挨打”的时代里,加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和奋发图强的精神。

钱穆在其史学名著《国史大纲》的扉页中曾特别指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即在熟知和认识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本土文化产生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仰,进而自觉地担负起继承和发扬它的历史使命。这是钱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点,他30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无例外地体现了这种精神。这种“温情与敬意”反映了他以民族文化传播人为己任的道德意识,反映了他强烈而深沉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感情。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一直是在自我否定的痛苦处境中走一条向西方学习、寻求富强的艰难道路,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虚无主义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乃至在目前的文化讨论中,有的人还总是把传统文化一概地视为现代化的包袱、障碍,惟恐丢弃不及。这一方面是

(下转45页)

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人口老化是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将产生重大影响，使家庭逐渐向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化发展。这种发展变化趋势又必然削弱家庭赡养和保护老人的功能，使我国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受到冲击。由于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现象，必然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平均寿命提高，晚年生活需要照料的时间延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出生率降低，一对夫妇只生一、二孩子，承担照料老人的后辈人数减少，结果是必然加重家庭和社会照料、护理老人的负担。因此，人口老化要求服务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事业相应地发展，对养老保险制度，老年服务系统及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老年服务中心、老年医院等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就要增加社会在这些老年服务事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或劳务投入。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积累和劳务积累。

上述分析表明，人口老年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任何简单地说人口老年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只会有益或只会有害，都是不切实际的，片面的。我们应该全面地分析人口老化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从战略上趋利避害，早作准备，迎接人口老年化高峰的到来，使人口老年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注释

①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第12—24和477—481页。

② 杨宗传：《中国老年人口就业结构浅析》。《人口研究》1987年第3期。

④ 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和辽宁大学的五个人口研究所，于1987年初在北京市、上海市、湖北省吉林省和辽宁省进行的1%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调查。

⑤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时背景材料《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的《老年化：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险在中国》分册。

~~~~~  
(上接102页)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不加分析地苛责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对当前现代化建设中的重重困难和阻力，也缺乏具体而细致地研究，以致忽略了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传统与现代化不是互相对立的抵抗力量，而是民族历史长河中紧密相联的不同阶段。一个民族的生机和活力，兴旺与发达，首先来自于民族内部对自身的坚定信念，来自于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信心。而这种信念和信心的基础便是国人对本民族历史的了解和热爱。当今中国人需要的正是振奋民族感情，用使命感代替自卑感、代替虚无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穆对中国文化充满民族感情和道德精神的研究与阐扬，是十分重要而有价值的。

#### 注释：

①③④⑤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81、127、324、325页。

②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6、57页。

⑥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4页。

⑦ 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版。

⑧ 参见⑥第四章“文化之两类型”。

⑨ 《论语·为政》。

⑩ 《论语·述而》。